

谈书说文

王梦奎

我这半辈子同书有不解之缘。起先读书，从发蒙至今，除了有近半个世纪，以外，小部分是课堂的。

我生长于常州府城，与信使我度过了童年。任外甥范因大千世界，读书升入了学校。

想起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中学起就开始读报。第一次印成铅字生活的，是读高中一年级时的关于童年生活的回忆。时隔近四十年，至今就在目前。

我以从事文学工作为荣，不惑之年又转行孔夫子和随之而来的文化繁荣。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推动下，我在写作上获得了一个不算好的收成。我多年来从事的工作，上是在八小时之外读书和写作。

如元大的变故，余生可能这样度过，三朝兴废几滴泉，批书看风惠泽长，数国但凭三寸管，怀师忘亲九回肠，每从昨日思今日，却把他乡作故乡，何当同为归鸟赋，三千年子沐民康。

书目文献出版社

(京)新登字189号

谈 书 说 文

王梦奎 著

书目文献出版社

(北京文津街七号)

北京朝阳区北苑印刷厂排版 涿州市新华印刷厂印刷

书目文献出版社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787×1092毫米 32开本 7.0625印张 129千字

1992年12月北京第1版 1992年12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1—5000册

ISBN 7-5013-0975-2

G·253 定价：7.00元

自序

我这半辈子同书有不解之缘。起先当然是读书，从发蒙至今，读了将近半个世纪。所读的书，小部分是课堂的，绝大部分是课堂之外的。我生长于穷乡僻壤，书籍使我知道了耳闻目见范围之外的大千世界。读书引发了写作的欲望，想把自己的所见所闻所思告诉世人。从中学起就开始涂鸦。第一次印成铅字发表的，是读高中一年级时写的关于童年学习生活的一篇回忆。时隔近四十年，当时洋洋自得的兴奋劲儿，至今犹在目前。

吾生有幸，大学毕业后实现了从事文字工作的愿望，不惑之年又躬逢拨乱反正和随之而来的经济和文化繁荣。在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的启迪和推动下，我在写作上获得了不算坏的收成。我多年来在机关工作，大体上是在八小时之外读书和写作。读书，写书，作文，编书，几乎是我唯一的业余生活。看来，如无大的变故，余生可能还将这样度过。

这是一本关于书的书。内容大抵分为四个部分：一是谈自己著作和写作体会的，二是我参与编辑的部分图书的序跋，三是为别人著作写的序言、书评和文评，四是谈书和读书札记之类。每个部分，都

依我的惯例，以写作时间先后为排列次序。因为内容不外乎书与文，故名之曰《谈书说文》。此类文字，看似轻松，写起来却颇费力，似乎比经济学论文还要艰难。我是把此类文字当作一种特殊体裁的散文来写作的。

经常有青年朋友问：怎样读书，怎样写文章。他们想知道，一篇文章或一部书是怎样写出来的，一部书是怎样编成的。“文章千古事，得失寸心知。”老实说，我虽年过半百，读写几十年，至今仍在艰苦探索，实在不敢说自己有什么成功的诀窍可以示人。但我想，如实地把一个过来人的切身感受告诉他们，使他们知所趋避，或许不是没有益处的。我还希望，这本书能便于读者对我的著作的了解和批评。某些篇，可以为专门家提供一点出版史的资料。

本书所辑，大多是篇幅短小的文章。全书六十一篇，短者不过二三百字，个别长的也只有四五千字。这样可以节约读者的宝贵光阴，而且便于在茶前饭后的轻松气氛中阅读。篇幅过长，可目为严肃学术论文的一些读书札记，就舍弃了。

是为序。

王梦奎

1992年2月4日凌晨，春节鞭炮声中，于北京之翠微西里

目 录

自 序

我的学习和写作·····	(1)
理论研究犹如登山·····	(6)
或许很快就会变得陈旧·····	(8)
一份宝贵的精神遗产·····	(10)

——《论反对官僚主义》引言和跋

《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序言·····	(14)
《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序·····	(16)
《论厂长负责制》序言和书摘·····	(18)
关于一长制研究的几个问题·····	(28)
《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经济》序言和跋·····	(30)
关于通货膨胀的思考·····	(33)
一部译稿的遭遇·····	(36)
编者和作者都要对读者负责·····	(37)
经济学文章写作杂谈·····	(38)

《技术经济和管理现代化文集》前言·····	(47)
在探索中稳步前进·····	(49)
《经济改革文丛》第二辑书后·····	(54)
《经济问题研究资料》出版前言·····	(57)

《论专业户》序言·····	(59)
城市经济改革的探讨和记录·····	(61)
《商品经济和社会主义》序言·····	(64)
获奖经济学文选编辑旨趣·····	(66)
不同意见的争鸣是有益的·····	(69)
一本没有出版的书的序言·····	(71)
加强企业史研究·····	(73)
一个尝试·····	(77)
取法乎上 仅得其中·····	(79)
《决策之友》题记·····	(81)

各抒己见 文责自负·····	(82)
积极探索 渐趋深入·····	(84)

——评冯子标主编《政治经济学》(社会主义部分)

立意新颖 别辟蹊径·····	(88)
----------------	--------

——评《厂长思考问题的方法》

列宁经济思想研究的一个新成果·····	(91)
一朵悦目的小花·····	(95)
对正村公宏论文的评论·····	(98)
推荐一本普及性理论读物·····	(103)
一部有特色的经济史著作·····	(105)
在实践中不断深化对社会主义的认识·····	(109)
关于《司马懿和司马故里》的通信·····	(112)
一本关于司马懿的书·····	(116)
文如其人·····	(119)

研究专业城市管理体制的一部开创性

- 著作…………… (124)
各行各业都要学点经济知识…………… (126)
文评八则…………… (131)

- 从列宁的一篇序言谈起…………… (143)
观音的性别…………… (147)

——夜读偶拾

- 重视社会科学普及读物的出版…………… (149)
关于《中国大百科全书》条目的通信…………… (154)

《关于评弹的谈话和通讯》的编辑和

- 出版…………… (155)
对《厂长工作条例》的几点修改意见…………… (157)
加强行业发展与管理的研究…………… (159)
企业领导班子建设的一项重要工作…………… (163)
不能忽视钢铁工业…………… (167)
中国国情和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 (169)
贺河南省粮食经济研究会成立…………… (182)
一个创举…………… (184)

——贺《当代中国经济学家文丛》出版

- 我们的脚踏上了实地…………… (187)

——读党的十三大文献札记

- 追随实践的步伐…………… (191)
重视金融知识的宣传和普及…………… (193)
“小康”四题…………… (195)

——读中共中央关于十年规划和“八五”

计划的《建议》

正确把握经济发展和改革开放的新阶段… (203)

开展农业社会化服务的一支重要力量…… (208)

桃李春风惠泽长…………… (211)

——沁阳师范杂忆

我的学习和写作·

我于1938年4月13日出生在河南省温县一个贫苦农民的家庭里。我们那个村子叫安乐寨，位于黄河北岸，古称“司马故里”，是三国时代司马懿的故乡。在我儿时的记忆里，安乐寨既不安也无乐，有的只是战乱，灾荒，疾病和饥饿。我最早碰到的经济问题，是没有饭吃。1943年闹蝗灾，颗粒无收，靠树皮草根充饥，当时饿死的人很多，我算是幸存者。

抗日战争胜利后，我开始上小学，于1951年底毕业。因为家境困难，家里人要我报考公家管饭的银行学校。一则因为年纪太小，二则我时尚不知银行为何物，对毕业后将要从事的银行工作毫了解，便到与温县毗邻的沁阳县上中学。先是在沁阳师范初中部，毕业后考入沁阳第一中学高中部。当时，由于民主革命的胜利和人民共和国的建立而激发起

* 这是山西人民出版社1979年出版的《王梦奎选集》的代前言

来的举国上下普遍的热烈情绪，在中学生中也有强烈的反响。1956年，当我满18周岁的时候，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在学业上，这个时期也有比较快的进步。在当时的乡下，读书很不容易，难得见到什么书，能读到的只是庙会小摊儿上出售的唱本和通俗演义，又买不起。幸运的是，在上小学的时候，由于一个偶然的际遇，校长指定我管理学校的小图书馆，利用课余时间到那里服务。这使我有机会接触了课本以外的许多书籍，并由此产生了浓厚的读书兴趣。从小学到中学，我如饥似渴地阅读了大量我所能懂的、似懂非懂或根本不懂的书籍，使我这个生长于穷乡僻壤的人，开阔了眼界，增长了见识，在一定程度上弥补了长期处于农村闭塞环境所造成的文化知识的不足。当时，我曾经幻想成为作家，把自己经历的和看到的苦难和欢乐，写给世人看。在地方报刊上发表过诗歌和散文，当然都是很幼稚的。采辑过民间故事，并且试着写过小说，但没有成功。我也曾经希望成为历史学家，这是从故乡悠久的历史、大量的文物古迹和丰富的民间传说中所萌生的遐想。

但是，中学毕业后，我并没有进文学系或史学系，而是选择了经济学。这是因为，随着社会主义改造的胜利，经济建设日益成为人们普遍关注的问题，当时我觉得，搞经济学或许能够为国家多作点事。我是1958年进入北京大学经济系的。在北京大学的几年间，虽然读书的气氛随着政治气候的变化

而时浓时淡，我始终珍惜着得之不易的学习机会，未敢稍许懈怠。北京大学有百家争鸣和兼容并蓄的传统，虽然也不免受到“左”的错误的危害，但学生毕竟可以接触到各种学术思想。图书馆是敞开的，允许学生借阅各类书籍。北京大学图书馆藏书丰富这种得天独厚的条件，给了我充实自己的机会。对北京大学的老师们，我至今怀着敬意。他们给了我许多宝贵的教诲，而且比较开明，即使同他们的见解相左，也不介意，甚至还加以鼓励。1960年，我发表了第一篇经济学论文，是关于农业问题的。后来还写过两篇关于孙中山和朱执信经济思想的论文，并同人合译了伊·戈·布留明的《政治经济学中的主观学派》一书。

1964年8月我在北京大学经济系毕业后，到《红旗》杂志做编辑工作。在经济研究方面没有取得什么进展，便开始了十年动乱。1969年5月，被下放到“五七干校”，一去就是六年多。书籍帮助我熬过了那段漫长而苦闷的岁月。当时我正值“而立”之年，身强力壮，应付繁重的体力劳动和无休止的思想检查即所谓“斗私批修”，精力尚有余裕，就想方设法找书，秘密和半秘密地阅读。主要是读了中外历史和哲学。中国大地上所发生的一系列令人震惊和目眩的事件，引起我的深思。读书又使我从历史上和思想上得到借镜，帮助我对以往的和当时发生的事件进行认真的反刍，真是受益匪浅。

1975年8月，终于结束了比正规大学还要漫长

的“五七干校”生涯，到第一机械工业部调查研究室工作。在这里工作三年多时间，使我对工业经济和企业管理问题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1975年10月到1976年6月，写了《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一书，1979年由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这本书里所讲的农业机械化，是泛指以机器大工业来改造农业，包括在农业中广泛应用现代科学技术。当时是想从农业的根本技术改造这个侧面，为实现四个现代化呐喊。这是我的第一本著作。

1979年初，我被调到中共中央办公厅研究室工作。翌年初，这个机构成为新成立的中共中央书记处的研究室，我在这里一直工作至今。

自1976年结束十年动乱以来，我的经济研究工作进展还算顺利。这是时势使然。十年来，我发表了100多篇文章，其中绝大部分是经济方面的。也出版了几本书，除上述关于农业机械化的一本以外，还有：《两大部类对比关系研究》，这是一本研究再生产问题的专著，中国财政经济出版社1983年出版；《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这是一本经济学论文集，河南人民出版社1984年出版；《论厂长负责制》，这是在1980年以来发表的关于厂长负责制的若干篇论文的基础上写成的一本专著，经济日报出版社1986年出版。此外，我还同别的同志合写过几本书，主要有：《论反对官僚主义》，天津人民出版社1980年出版；《我国经济建设中的若干原则问题》，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1年出版；

《农村经济概说》，北京出版社1982年出版，这本书被评为1979—1982年农村优秀读物。

我有目下中国中年知识分子所共有的欢乐和烦恼。我大体上是利用“八小时之外”读书和写作，而需要研究的问题又太多。虽然已经把休息和娱乐的时间压缩到最低限度，时间还是不够用，许多想法不能及时加以整理和深化，并且形成文字。这常常使我感觉可惜，虽然写出来也未必是什么高雅的东西。

对于自己写的东西，我不必多说什么话。其成败得失，最好让我素所敬重的经济学界的前辈、同行和读者来批评，由实践来检验，任时光去洗刷。我要说的只是：回首往事，我虽然可以因未曾懈怠而聊以自慰，但并没有取得什么象样的成绩，连自己也很不满意。

在当今中国，经济学家是幸运的。1983年6月，我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的序言里说过：“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向经济工作者和经济理论工作者提出了很高的要求，也给他们的工作开辟了空前广阔的天地。我虽然自度才学不逮，也将勉力为之，希望能比过去有所长进，以不辜负这个伟大的时代。”今天，我仍作如是想。

1986年4月13日

理论研究犹如登山*

这本选集，是应山西人民出版社之约而编辑的。我从1979年以来所写的文章中，选出46篇，成为呈献于读者面前的这本书的样子。

这些文章，从体裁看，有经济学论文，有经济史考察，有经济政策建议，有经济调查和经济情况分析，也有经济学方面的其他形式的杂著。这并不是说我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而只是表明，我曾运用过这些形式，来表达我对于经济问题的见解。我是赞同“文以载道”的主张的。这些文章，尽管形式多样，具体内容也涉及比较广泛的方面，但都不外乎是对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经济体制改革问题的探讨，从大的方面说，都在经济学应该关注的视野之内。

理论探索犹如登山，只能拾级而进。这是一场永无停息的接力赛，要靠众多的人，甚至要靠多少代人的共同努力，方能穷其堂奥。我们今天对于社会主义经济的认识，无疑比过去丰富得多，深刻得多了。但是，社会主义社会还处于它的童年时期，实践还没有全面展开，矛盾还没有充分显露。因此，

* 这是《王梦奎选集》的跋。

关于社会主义经济的理论概括，目前还不可能达到十分深刻和完备的程度，只能随着实践的发展而逐步深入。古人说，后之视今，犹今之视昔。若干年后回顾今天的认识，必定能愈益清楚地看出这一点。我给自己规定的努力目标是：如果将来人们的认识，已经登上了比如说第一百级阶梯，回头来看，我今天的认识如果能在第一级、第二级或者第三级阶梯上，我就很满意了。因为这至少可以表明，自己是走在攀登和接力赛的路上，没有陷入歧途。对于我来说，这个目标是不算低的。这并不是想放弃主观上的努力，而是对于自己的局限性的清醒认识。

文章辑而成册，在编排上，既可分类，也可编年。我取后者，只是对个别篇的次序作了一点小的调整，以便于读者参照。这编年的理由，我在收入本书的《〈我国社会主义建设道路的探索〉序》里，作过说明，这里不再说。

我期待着读者的批评。

1986年4月13日，于北京

或许很快就会变得陈旧*

这本小册子的初稿，是1975年下半年到1976年上半年写成的。

1975年1月，周恩来总理在四届人大的政府工作报告中，再一次响亮地向全世界宣告：要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农业、工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的前列，把我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的现代化强国。

当时，“四人帮”疯狂破坏社会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建设，妖域横行，阴霾满天。在这种情况下，周总理根据毛主席指示提出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犹如平地一声春雷，使人们耳目一新。大家感到有了新的希望，愁眉锁眼的姿态为之一扫，都说：这样干，有劲头，有奔头。实现四个现代化，深刻地反映了人民群众的迫切愿望，理所当然地受到了全国亿万人民的衷心拥护。至于尔后“四人帮”又进行了何等疯狂的反扑，妄图扑灭全国人民心里点燃起来的实现四个现代化的火焰，把人们重新打

* 这是1979年天津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农业的根本出路在于机械化》的后记。

入了闷葫芦，现在已是举世皆知的事实了。

正是在实现四个现代化的伟大号召之下，我才鼓起勇气，不揣浅陋，利用工作余暇，写出了这本小册子。无非是想为实现农业机械化和四个现代化呐喊几声，也可以说是造点舆论吧。从一九七五年十月着笔，前后用了几个月的时间，于1976年六月写出初稿。本来出版社去年就计划付印，因我无暇修改定稿，延搁至于今日。最近匆匆改了一遍，主要是根据现在揭发出来的事实，增补了批判“四人帮”破坏农业机械化罪行的内容，并补充了一点新的材料。

谨以这本菲薄的小书，贡献给伟大的农业机械化事业。在本书写作过程中，曾经得到一些同志的热情鼓励和帮助。天津人民出版社的同志，也给了我很大的支持。在此，一并向他们表示诚挚的感谢。

我们搞机械化大农业的历史尚短，实践经验还不多，不少问题有待于进一步探索。加之作者见识不广，水平有限，这本粗浅的东西，至多不过是一块引玉之砖。书中所论述的东西，或许很快就会变得陈旧。这也是好事。说明我们在经过多年的停滞之后，又在大踏步前进了。

1978年1月